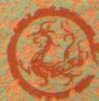


聂振斌 著

王国维美学思想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国学研究丛刊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聂振斌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聂振斌著. —2版.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4

(一鳞丛刊)

ISBN 7-5610-3040-1

I. 王… II. 聂… III. 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6124 号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聂振斌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1 字数: 200 千

1997 年 3 月第 2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责任编辑: 刘雪枫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申 重

ISBN 7-5610-3040-1

B·114 定价: 12.50 元

序

齐 一

这本书是聂振斌同志继《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之后的又一力作。他在三年间完成四十多万字的理论著述，标志着一位中年学者的勤奋和成长，尽管他对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家的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我读部分书稿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根据确切的资料，经过认真的分析综合、比较研究，得出论断，有些见解确有独到之处。如果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自然会从中受到许多深刻的启迪。

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确实的文献为依据。作者搜集有关王国维美学思想的著作，经过认真的考察，然后确定取舍，这种功夫表明作为研究工作者的基本态度。例如，他对于《人间词话》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决定以最早版本为依据，以尽可能地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这种在学术研究上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在经历了浩劫所带来的思想混乱之后应当特别提倡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正是由于作者对王国维的原著进行了切实的探索。因此，也就能从中发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思想。他从王国维关于意境的分类与意境思想整体的联系中看出，这位思想家始终是围绕主体与对象这一根本关系进行剖析的。同时指明在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中虽然没有正面发挥“超脱”的观点，但从不提善的曲笔上，也可以窥出“超脱”观点的潜在作用。正

是由于这种观点，造成王国维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功力的扎实，和某些飘浮的表现有着显著的区别。和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忽视材料而一味盲目地套用空泛乃至错误的理论，从书面的片言只语出发，推演出完全背离实际的论断。他们运用材料，不过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成见确定取舍和纳入框架。不是从对材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比较、分析、综合的过程中得出应有之义，而是凭主观意图到材料中去寻找个别“例证”，随意发挥，信口开河。于是在对于历史研究中，就出现了按照个人意志扭曲古人、歪曲事实的现象。历史科学不同于艺术创作，它要求复原而不容塑造。即使是历史剧作中的艺术虚构，也应当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随意篡改和褒贬。例如，把封建帝王美化和现代化的作法，就是无视历史的表现，也很难被公众所接受。

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而不是形式主义地标榜什么时髦的思想。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样需要从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中探索其本来面目，排除片面的看法，求得全面的理解，从思想演变中发现本质和规律，从比较研究中评定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在本书中论述王国维的文艺批评部分，清楚地体现了这种科学方法。作者指出其前期与后期的差异，认为前期是从康德、叔本华的美学原则出发，运用科学分析方法，思辨性、逻辑性较强；后期多是从具体对象出发，运用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直感性、经验性较强。而前期与后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的区别只是表明王国维文艺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并非一贯正确，也不是一无是处。同时，作者从这些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提炼出王国维的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就是：不抱残守缺，不循规蹈矩，敢于大胆尝试和创新。研究王国维的思想发展和治学精

神，使作者体会到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在前人已取得的经验、成果基础上的创新。王国维的国学根柢很深，对西方新学又很敏感。他既不废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而照搬西学，又不恪守老一套而拒绝新东西，而是把中与西、旧与新加以比较、分析、融会贯通；舍其短，取其长，问其疑，发挥自己的见解，因此才有“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重大意义。王国维取得学术成就的途径，完全不同于“国粹派”和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这两种倾向由来已久，至今并未绝种：陶醉于中国古代文化而孤陋寡闻，不研究外国的思潮和流派而妄自尊大；对祖国文化持虚无主义，西方的一切都好。这两种极端，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活标本，对我们的学术事业都曾带来极大的危害。作者充分肯定王国维的治学精神和方法，自己也是力争用这样的精神和方法研究王国维。

在研究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作者认识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具体分析是取得成果的关键。他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阐明了王国维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王国维认为，中国哲学与艺术的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不给学术以独立的地位，完全成为某种政治的工具或附属品，遂使学者也常常假哲学艺术之名，以达其政治目的之实。王国维说：“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作者指出，王国维的超道德、超政治的思想，固然有其理论上的片面性，忽略了文艺与道德政治相互联系的一面，但是不能否定这一思想对于反对把文艺完全置于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奴仆地位这一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证明，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是在互相作用中发展的，片面地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他，必然出现偏差和逆转。作者不仅阐述了王国维关于艺术与政治相互

关系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发挥说，过去的某些文艺批评，在导出某人思想观点是“唯心主义”之后，接着就是“消极”、“反动”的判决。这是一种幼稚的、简单化的儿戏，很省力气却为害非浅，把历史上许多闪闪发光、十分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当成“历史垃圾”，把对民族、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思想家置于极不公道的历史地位。作者的这一看法，无疑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应当如何发展，王国维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作者指出，他是从纯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观察中国近代几次重大的学术争论，反对以门户、宗派、政党之见参预学术争论之中，反对以狭隘的急功近利的观点看待普遍的、全人类的学术事业。因此，学术不应有新与旧、中与西、有用与无用的界限。中与西各有长短，新与旧一脉相成，有用与无用都不是绝对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融会贯通，全面发展，以探索真理为最高宗旨。作者认为王国维对中国近代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所作的评论与批评，对如何发展祖国学术的见解，是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进步历史意义的。

中国有句老话：“文如其人。”在我看来，这只能反映部分事实，并非普遍真理，因为作文的人是很复杂的。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的质朴和直率。他不善于花言巧语，却勇于仗义执言。他的著述和他的为人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矫揉造作。这种文风，必是应当在学术工作中提倡，我愿意为这本书写序，是由于我赞赏作者这样诚实的工作。为了美学这门科学的茁壮成长，我也希望有志于本学科建设的同志一道，逐步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之路，使我们的共同事业能够顺利地开展起来。

引 言

中国近代美学产生于何时？谁是它的最早奠基者？这两个美学史上的小问题，由于学者们并没有注意过，至今尚未有一种明确的说法。我不揣浅陋，先发表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我认为，中国近代美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年，它的第一个奠基者是王国维（当然，奠基者不止他一人，至少还应有蔡元培）。

何以见得？

二十世纪之前，“美学”为何物，中国人不得而知；二十世纪初年，王国维把“美学”从西方引进中国加以传播、发挥，并且应用于文艺批评，开始了美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划分古代与近代美学史的界标，不应该跟随一般的历史发展阶段走，而应该以美学思想自身发展的性质、特点为主要根据。近代美学不同于古代美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亮出了自己的身份——“美学”，标明自己的独立存在，不像古代那样，完全依附在哲学、道德、文艺之中，而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从此人们开始了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注意研究美的自身规律和特殊性质、价值。美学与哲学有下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道德政治也不是

主奴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领域；美的价值，既不是单纯的真，也不是单纯的善，而是它“自身”。这决不意味着它完全脱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恰恰相反，从此它几乎与所有的学科（自然的、社会的）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只是不局限于哲学、政治、道德、文艺罢了。它在研究角度、方法方面，所表现出的广阔性、多样性，也是古代无法比拟的。

依据上述理由，系统考察一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便不难发现，在他之前的美学思想，不具这种时代特点；在他同时代的人们中，谁也没有他这样早的表现出近代美学的时代特征或这种特征的萌芽。因此，笔者把他的美学思想称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石”。

目 录

引言.....	1
一、王国维其人评说.....	1
(一) 与世无争及不光彩的“晚节”	4
(二) 近代学坛上的“大师巨子”	12
(三) 历史命运的悲剧	26
二、美学思想的概观与来源	35
(一) 概观	37
(二) 思想来源	41
1. 老庄的厌世哲学及无为与大美.....	44
2. 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	48
(A) 康德的审美超利害说与天才论	48
(B) 席勒的审美游戏说	53
(C)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美学思想	54
三、论美及审美范畴	59
(一) 美的性质——“可爱玩而不可利用”	59
(二) 审美基本范畴	68
1. 优美与宏壮	68
2. 古雅	71

3. 眩惑	76
(三) 审美超利害说之批判	78
四、审美与美育	88
(一) 提倡美育的历史背景	88
(二) “嗜好”——审美心理分析	94
(三) 美育的特点及其与智育德育的关系	102
五、悲剧——《红楼梦评论》	110
(一)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悲剧观	110
(二) 《红楼梦评论》的内容	115
(三) 《红楼梦评论》的美学意义及其影响	124
(四) 与《红楼梦评论》同期的文学批评	133
六、意境——《人间词话》	139
(一) “道其面目”与“探其本”之历史比较	141
(二) 文学的本质分析	146
(三) 意境	152
(四) 意境诸条件	168
七、历史考据与文学批评——《宋元戏曲考》	181
(一) 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新开拓	181
(二) 中国戏曲的起源与发展	192
(三) 元代杂剧的文学与美学价值	202
(四) 为通俗文学正名及其历史意义	209
八、王国维文艺批评综论	217
(一) “纯粹美术上之目的”与美学批评标准	217
(二) 新方法的“引进”与融合	221
(三) 历史考证、文字训诂与艺术批评	227
(四)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贡献	247
后记	253

一、王国维其人评说

本书旨在评述王国维美学思想，为此，需要“知人论世”。因此，在正文开篇之前，先评说其人。

王国维，字静安（或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一八七七年生于一个不太富裕的书香家庭，自称“中产人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从小接受旧传统教育，走科举道路。十五岁（一八九二年）中秀才，名噪乡里。以后，又连续两次应乡试，皆不中，从此放弃了科举仕途，转而学新学。但他步入青年时，家境已很窘困，无力就学深造，出国留学更无条件，不得不自谋生计，自学成材。二十一岁（一八九八年）离浙江到上海，经人介绍任《时务报》校对。不久，由于罗振玉发现他是个人才，资助他一面工作，一面到东文学社学哲学、文学、英语、日语等，从此他与罗振玉结下不解之缘，罗振玉成为影响他一生道路的重要社会关系。二十四岁（一九〇一年秋），由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学习物理、数学等。第二年秋，因病回国，相继于上海、南通、苏州等地从事教学工作。三十岁（一九〇七年）由罗振玉引荐入京，任清朝学部总务司行走之职。其后，又改任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编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典籍，并从事中国诗词、戏曲的研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亡命日本，王国维也跟随他留居日本五年，专治国学（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已完全失去对西学的兴趣。三十九岁（一九一六年）回国，先在上海当编辑、大学教授。四

十六岁（一九二三年），经人推荐作了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后又被聘为清华研究院掌教，从事教学和研究。五十岁（一九二七年）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从王国维青年时期算起到他离开人世，只有短短的三十年，在中华大地上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变：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百日维新、庚子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残杀、欺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的一个个严峻的历史关头，每一个中国人都必然接受它的考验。革命者、志士仁人，披荆斩棘、流血牺牲，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卖国贼、野心家，辱国求荣，大发国难财。非常的时代，一下子把一些人造就为英雄，同时又充分暴露出另一些人的丑恶嘴脸。真善美与假恶丑，在他们那里界限清晰，壁垒分明。司马迁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重是轻，对他们“盖棺论定”是比较容易的。但不要忘记，还有许多历史人物，要对他们的一生作出明确的结论，并不如前二者那么轻而易举，那么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这一部分人既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士，又不是为虎作伥的奸叛丑类。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性格操守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令人难用简单、明了的语言作出评定。即使有人凭一时的政治潮流而勉强为之，但终究是立不稳脚跟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王国维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自王国维“盖棺”那天起，人们对他的估价和认识就存在很大的分歧，并且延续迄今。有些人，抓住他为亡清殉身的很不光彩的“晚节”，说他是反动的封建遗老，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罪人；有些人相反，以最高的荣誉褒奖他的这种“晚节”，并由此扩展开去，说他好得不能再好了。折衷于这两

极之间的人，虽然也存在着许多分歧，但他们的共同之点，也有可取之处，总是力求全面一些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尽可能多给人们一些实在的东西。不过，这种人虽居多数，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也是欲言而不敢尽言，担心自己落个与“反动”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常常增加一些含混之词，或故意加强一些“批判”的色彩。致使一代大学问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某种“批判”的需要偶尔提到他外，似乎被世人遗忘了！被遗忘，对王国维个人来说不够公平，对祖国的学术发展也是无益的。近些年来，由于“政治气候”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朗，人们敢于畅所欲言，曾被“割断”的历史，又得以连结。这就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许多近代历史人物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评价提供了条件。当然，要评说王国维并做到全面而公正，对我来说，似乎有些不自量。不过，为了系统地评述他的美学思想，并尽可能深入一些揭示其性质和社会意义，又觉得不能回避这一难题。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美学思想、艺术观点（其他学术思想也同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形成、发展、变化，总是要与其人的历史观点、政治态度、实际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环境，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王国维也不能例外。如不顾这一事实，就美学而美学，纯而又纯，必然陷于主观、片面的谬误之中。因此，此题虽难作，且又自知力之不足，也不敢知难而退。好在先贤及当今的学者著论在前，足资吾侪学步在后之勇气。

既然旨在评述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不妨也用审美的眼光对其人作一下总观。在中国近代史上，王国维不愧为资产阶级启蒙的思想家之一。但这位思想家并不完美和谐：伟大与渺小，崇高与滑稽，悲观与不停地探索，政治上的矮子与学坛上的巨人等对立因素兼备于一身，形成了思想上的矛盾、痛苦，行动上的摇摆、倒退，终于以自杀为结局，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格和历史命运的悲剧。

(一) 与世无争及不光彩的“晚节”

王国维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极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与世无争的政治态度。当然，不能由此而说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政治斗争，对王国维不发生多大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自己怎样想“超”，怎样抱定“无争”，而事实上，他的思想、生活道路、命运，总是要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尤其在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代，矛盾激化，风云多变，而每一事变立刻要牵动每个人的利害、前途，影响其思想、观点，怎么能超然而无动于衷呢！只是王国维的反映与表现比较消极、冷漠，与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的确大为逊色。他既没有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实践，也没有为革命救国的政治斗争呼号、鼓动，唯一的反映是借诗词抒发个人的慨叹与苦闷：“一点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确太无情？”（《八月十五日夜月》）“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歌触绪来。翁埠潮回千顷月，超山雪尽万株梅。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题友人三十小像》）以上二首，据萧艾考证，前者写于一九〇〇年，后者写于一八九九年，^①均因感于战乱频仍、山河破碎而发。但是没有对侵略者的揭露、痛斥、鞭挞，只有对沧海桑田的感慨，不满现实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因此要借酒浇愁，寄托山林。多么软弱无力！这二首还是能比较明显看出因时变而发，而更多的诗词作品，其思想倾向都是很隐晦的。遍观其遗著，除早期

^① 见《王国维诗词笺校》第8—11页

关于教育的一些杂文、议论、书信及晚年的《论政事疏》外，庶几无从窥其政治倾向。在他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政治的、军事的重大事变，唯有中日甲午战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对他的刺激较深，反映较明显，并且直接影响他的人生道路发生重大变化：前者，激励他求新，促使他加入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潮流；后者，反使他失去了对西方新学的信心，转而专注于“国学”，逐渐变得保守起来。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也以这两大事件为时限，在兴趣、信仰、倾向、成就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王国维说，“甲午之后，始知世界尚有新学”（《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他认为，中国败于日本，是由于贫穷落后和政府腐败。要改变这种可耻地位，必须学习西方，发展学术，改革教育，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繁荣经济，加强国家的实力地位。到此时他已感觉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上。他说：“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页）这一新的认识，促使他转向新学，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数学、物理学以及外语等，并且撰写了一系列的哲学、美学、文学、教育等方面的论著与杂文（收编在《静安文集》及续编中），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联系中国古学和现实问题作了不少发挥，表现出对清政府的某些不满，提出了改革要求。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接受了西方新思潮的影响。虽然表现的并不激进，但对于内忧外患和国家前途的担心，常常溢于言表。继甲午之役后，德帝国主义侵占胶东湾，“俄法踵起要挟”（同上书第4页），他十分愤慨与忧虑，“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同上书第6页），表现出反帝爱国的思想倾向。虽然他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之外，与书册为伍，但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的倾向，还是可见的。王国维

接受康德等人的影响，认为从事学术研究是“超政治”的，并以此为自己终生的志趣，因而很少涉足于政治斗争实践。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的人常常把此时的王国维也推到封建守旧势力一边，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王国维虽然从青年时期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思想，成为进步思潮中的一员，但是由于他在学术观点和学术实践上坚持“超政治”、“超利害”，因而对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毫无兴趣，认为那是职业政治家的事，与学者、艺术家无关。由于恪守这一信条，很多政治事变，很难发现他是拥护或是反对的态度。对于辛亥革命——本属于自己阶级的事情，他却不关心，不与闻问。武昌起义的成功，不见他欢迎，也未表示反对，似乎感到是一种威胁，而跟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他留居日本五年，国事不闻，放弃西学，完全潜心于“国学”的研究。这一段时间，他极少谈论时政，不仅见不到这方面文章，就是与国内外亲朋好友往来信件也都是交谈治学之事。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并未促使他继续前进，反而使他走了回头路。这是为什么呢？一九一六年从日本回国后，对时政开始关心起来，谈论较多，但方式不是公开发表文章，而是通过书信与朋友私下交谈。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对张勋复辟表示拥护，并认为是一种“进步”。对张勋的垮台十分痛惜，“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三百年乃得此人（指张勋），庶足饰此历史”。^①认为张勋这个封建余孽，乃是大清三百年历史的光彩，因而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与军阀割据并没有是非善恶之分，“自辛亥之冬至于今日，不及五年，成败起灭，均在我辈眼中，‘成家与仲家，奄忽随飘风’，作此语时，当

^① 转引《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第400页。